

鲁光新书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出版 深深怀念“鲜活”在脑海中的友人

本报记者 刘晨茵 沈爱群

“80后”老顽童鲁光又出新书,书名就叫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。

这是记者出身的鲁光第N次出书。年轻时就笔耕不辍的他,此前曾出版有《鲁光文集》七卷、《沉浮庄则栋》《东方的爱》等;《近墨者黑》,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鲁光原名徐世成,浙江永康人。没错,他是那个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的作者鲁光,是那个善于画画的画家李苦禅先生的弟子鲁光,也是画出被誉为“创新的中国画”《生命》的鲁光。

“笔名‘鲁光’叫响了,以至于我的原名反而没几个人知道了。”采访时说起,生性豁达的他哈哈一笑,“那就让世人都这么叫我吧。朋友们也都习惯这么称呼我了。”

新书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出版,自然也就延续了那个大家熟悉的笔名“鲁光”。

那些老朋友,都鲜活地在他脑海中。鲁光的朋友遍天下。采访时,记者听他掰掰手指头随口说出的,都是体育界、文化界、艺术界的名人。

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书中,鲁光共记录友人40多位,其中体育界人士8位,包括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、国家体委原副主任何振梁、中国女排前国手陈招娣、珠穆朗玛峰登顶英雄王富洲等。其余,均为文化和艺术界人士。

在本书序言中,鲁光写道:人生有起点,也有终点。起点站,车上挤满了人,但一路都有人下车,到达终点时,已稀稀拉拉。我一生交友无数,一路走来有人离去,一路散失,到了耄耋之年,熟人陆陆续续走了,晚走者陷入孤独。

1937年出生的鲁光,说起自己年纪时总爱套用南方人的习惯用法,报的是“虚岁”。“我今年87岁。”他这样告诉我们,“80岁以后,我基本就不大写作了。每天画画、写字,以休闲娱乐为主。”

寂寞时,思念往日的师友。他有几个不同年代的电话本,大小不一,早期的电话本已翻得破烂。“朋友们的电话、座机、手机号码,都在里面。人走了,号码仍在。”鲁光说,“这些号码已永远无法打通,但每一个号码,都会引起我的美好回忆,都藏着人生的交往故事。”

一桩桩、一件件,往事、故事,翻江倒海般萦绕在他的心头。“他们的艺术,他们的文学作品,以及与他们交谈,都鲜活在我的脑海中。”鲁光表示,“去年,就在这样的深深怀念中,我动手开始写这些老朋友的故事,珍贵的、难忘的。”

书名是自己题写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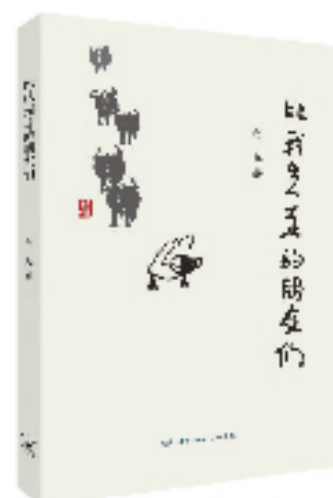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采访时,恰逢这本新书付梓。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国家体育总局老干部活动中心见面。北京今夏天气酷热,他坚持走到大门口等着我们,手里拿着一本新书。

“这是我拿到的第一本,送给你们。其余的,还在寄过来的路上。”鲁光说。

我们郑重接过他的新书,一看封面,便乐了:“鲁老师,这书名是您左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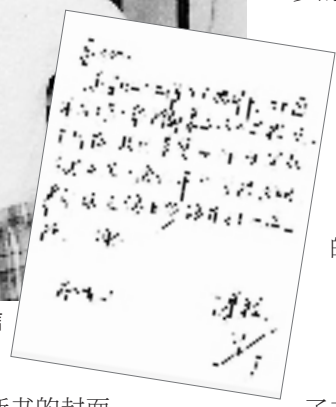
鲁光(右)与陈招娣合影(2012年11月底)



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书封。



鲁光(左)第一次采访萨马兰奇(1987年)



冯牧给鲁光的约稿信

题写的吧?封面上的牛,也是您的杰作吧?”鲁光点头称是。

江南人鲁光心思细腻。我们一翻开书,便发现他早已给我们题好字落好“款”了:落款用的“鲁光”,是他左手用毛笔题写;盖章的那方印,也是他亲自篆刻的。

这个落款和新书封面,极其生动地反映了他对自己80余年人生的总结:“绘画超过文学,左手超过右手,下半年超过上半年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鲁光曾写出过令中国人激动不已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《中国男子汉》。但他40多岁时在体育圈和文学圈干得风生水起、仕途光明时却选择急流勇退,转身投入丹青墨海“再也上不了岸”。他说:“如果没碰到李苦禅、崔子范两位国画大师,也许我会爬一辈子格子,在文学和新闻之路上走下去。”与两位大师相识,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”

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画家,退休后鲁光圆了自己人生的三个梦。鲁光的画拙朴厚重,为追求与画面协调,他开始

放弃右手圆润的书法,尝试用左手书写。久而久之,他的字与他的画一样,不取精美,但求率真。这样的创新,使得他的作品成了收藏爱好者的抢手货,他的国画曾出现在北京荣宝斋的展厅中,标价一点也不比那些画了一辈子的大画家们低;他还在北京和浙江办过颇有规模的个人画展,赢得一片赞美声。鲁光的名字,和中国画连在了一起。

就拿我们眼前的这本新书来说,书名“比我先走的朋友们”与封面上的几头牛,浑然一体;童趣、率真,是它的风格。很显然,正中那个朝向我们的简笔画是他自己;左上角背对着我们的五头牛渐渐远去,代表了“比他先走的朋友们”。

鲁光爱画牛。自从几年前和他成为微信好友,每天在朋友圈里看他的画便是一大乐趣。勤奋的他,每天坚持画画。画完用手机一拍,上传朋友圈。他用极为简洁的笔墨,画出了各种形态的牛,仁立静态的牛,奔跑活动的牛,蹒跚独行的牛,成群结队的牛。

“刚好我也属牛。那天随手一画,

编辑们都叫好,便组成了新书的封面内容。”鲁光说。

有趣的故事 一桩桩一件件

鲁光是善于写长文章的。1981年,他写中国女排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;其后,他写的《中国男子汉》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。2021年5月,鲁光被授予“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”。

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,他写的却是短文章,千字文。“这些先走的朋友们,每人都可以写一部书,至少可以写篇文章。”鲁光表示,“我不求全,每人只写一件事,一件永生难忘的事。”

他认认真真地告诉我们,每个故事都是他怀着深深的思念之情,倾心倾情写就,都是有感而发。

他写郭小川与他在南岗子胡同抢着买单;记述与金华同乡、大诗人艾青在陶然亭公园的合影;回忆晨练结束的萨马

兰奇,为了让采访迟到的他们有第一手素材,又一招一式来了第二遍晨练……

鲁光与中国女排前国手陈招娣是浙江同乡,他写陈招娣训练时自我加压、“三走三练”的《苦练》,曾入选初中语文课本。

新书中,他写陈招娣的坚强。2012年11月底,鲁光的画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,陈招娣身穿一身少将军装来到现场。鲁光在《陈招娣的最后岁月》中写道:

没有想到,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第二年的春天,4月1日,她因癌症去世,走时才58岁。她是中国女排老队员中头一个走的。她去世之后,袁伟民给我来过一次电话。他说:“她是癌症死的。去年底去参加你的画展,她告诉过我。已经到了晚期,她知道时间不多了,该做的事抓紧做。她还跑到福建见陈忠和。陈忠和还给她买止痛药。”

鲁光与著名人物画家吴山明是至交。2021年2月4日下午吴山明在杭州逝世,惊闻噩耗,鲁光悲痛之极,并在朋友圈写道:“想你,念你啊,山明!”

采访时,鲁光告诉我们:“我们亲如兄弟。山明是当今中国水墨画大家,尤其在宿墨人物画上,探索创新,自成一格。”

这件事,鲁光在书中也写了,题目就叫《吴山明的宿墨画》:他传统功底深厚,墨法运用到家、自如、天然。但他不满足这一套,一生在进行水墨实验。所谓宿墨,就是留在砚台上的陈墨——隔夜墨。我问他,你用得那么多,有那么多的宿墨吗?他笑道:“我去农村商店买滞销的墨汁。那些卖不动的墨汁,脱胶了就成了宿墨。”他先用宿墨画人物,后又用宿墨画花鸟。受他的影响,我和我家乡的不少画家都在用宿墨。每天砚台上的剩墨或墨渣,都收拾到瓶中。宿墨臭,但用到宣纸上有奇妙的效果。

冯牧给鲁光的约稿信

《比我先走的朋友们》,还记录了文学界前辈冯牧给鲁光的约稿信。

1985年,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型文学期刊《中国作家》创刊,冯牧出任主编。其时,鲁光写中国女排三连冠的报告文学《中国男子汉》刚脱稿,公安部的文学期刊《啄木鸟》就已拿走。此时,冯牧亲自给鲁光写信约稿,言辞恳切,令人无法拒绝。

“但我又不能失信于《啄木鸟》。我不能违约。我将冯牧的信,转给《啄木鸟》看。又将《啄木鸟》约稿在前的事实告诉冯牧先生。最后,《啄木鸟》主编高风亮节,将《中国男子汉》手稿送给冯牧,作为支持和祝贺《中国作家》创刊的礼物。皆大欢喜!”鲁光说。

就这样,40多个故事,记录了40多位比他先走的朋友。短小精悍,娓娓道来,可以一口气读完,也可放置案头慢慢细品。

在书中,我们也可以读懂鲁光。读懂他的古道热肠,他的豁达聪慧,以及他对朋友的忠义挚情。

书讯

《地名里的中国》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编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本书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个地名作为切入点,透过“地理+文化+历史”的多重视角,从地理、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民俗等多个角度探究地名背后的人文底蕴、文化根脉,清晰梳理了中国地名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规律,记载一种让国人潜移默化沉浸其中的中国精神。

翻开本书,犹如翻开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,读者可以看到上下5000年的中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自然生态发展故事,领悟其中历朝历代政治得失、成败兴衰以及社会发展规律。当读者面对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乡村与城镇,追溯这些地名的来历,会吃惊地发现,地名背后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涵,包括了中华大地的山川草木、千年传承的传统文化以及深刻独特的哲学思想。

《海上繁花》

杨怡芬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《海上繁花》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。故事讲述了1942年10月,日军战俘船“里斯本丸”号在中国舟山群岛海域被美军潜艇误击,船上千余名英军战俘危在旦夕,日军见死不救,意欲让整船战俘与船同沉。危急时刻,附近的渔民怀着世代相传的淳朴信念,英勇营救落水战俘,并藏起了其中三位。在各路抗日军民的护送下,这三名战俘辗转来到重庆,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暴行。

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点,塑造了血肉饱满、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形象,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。同时,对侵略与抗争、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。中国人民的淳朴和无畏是作者以“里斯本丸”沉船史实创作小说的支点——我们有这样的人民。

《何谓明代：“危机”下的世界史与东亚》

[日]冈本隆司 著
马云超 译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随着“14世纪危机”的爆发,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,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,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。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,在“17世纪危机”到来、明朝终结之后,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。

夹在“元末明初”“明末清初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(1368—1644)是什么样的面貌?除了残酷、血腥、互相倾轧的政治,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?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例,其后出现哪些乖离?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本书综合多种最新研究成果,让看似“一成不变”的明代变得鲜活、“有趣”了起来。

现一座文化的山岳

——读侯军《报人孙犁》

赵宗彪

在我的记忆里,孙犁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家,一个形成了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,一个坚守传统士人风骨的学者。

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生活于什么样的年代。在一个大时代里,人可以选择的范围,其实非常有限。清末以来的百年中国史,是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奋斗史,也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史。孙犁作为乡村的知识青年,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,并以自己的知识为建立美好的制度而努力。事实上,他在解放区的贡献,主要是以报人的身份作出的。至于作家,那是以后的事。与许多同类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,孙犁是由知识分子而革命家,再由革命家而重新回归知识分子,并以自己丰硕的创作成果,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,并为后人留下了“功成而不居,名彰而身退”的高尚人格形象。这固然有形势使然的因素,更多的,则是孙犁自己的选择。当自己投身的革命运动成功之后,各种利益唾手可得之际,愿意重拾旧梦、自甘寂寞、做一个知识分子的人,还是少数。孙犁人格最可贵之处,是保

持清醒的头脑,不人云亦云,不随波逐流。即使参加了革命,被组织所信任,要吸收他为党员时,他因为自己没有想好,主动要求缓一缓。在新中国建立之后,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直坚持不渝。因此而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,但他依然故我,不媚世、不盲从,作文不赶潮流。无论是新闻作品还是文学创作,没有违心的“当令”之作,在那样的时代,能保持这样的人格,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担当。

在社会的大变革时代,许多热血青年都会投身自己认为真理在握的事业,以自己的药方给世界治病,并为之奋不顾身。当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,大多数人都会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悦之中,或因形势势禁,都不敢作主流之外的思考。孙犁是少有的能够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例外之人,并且主动放弃许多唾手可得的名功利禄,而为寂寞之文。其自律之严,从他1995年即宣布封笔可见一斑。

一个人的文字作品,是他精神世界的外表。作为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,孙犁的作品独树一帜,如果要编新中国文

学集,他的作品是当然之选。孙犁的作品与他的仪表一样,干净、利落,没有多余的装饰。

如果说,已经出版的许多研究孙犁的作品,只展示了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形象,那么,侯军先生的《报人孙犁》一书,则向我们展开了孙犁作为一个报人的鲜明形象,还原了孙犁许多新闻作品的产生背景,作为编辑在文字背后所显现的长者风范。

侯军先生在文化界堪称全才,既勤奋又高产。他集作家、评论家、书法家、编辑于一身,著作二十七部,创作之余,还对茶道、策展等深有研究,并业绩丰硕。他以身之力,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,在孙犁研究上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。侯军从1988年参加首届孙犁作品研讨会上提出“报人孙犁”的观点,到今天出版《报人孙犁》,三十五年来,他为之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。现在,“报人孙犁”的概念与“作家孙犁”一样,已经深入人心。

《报人孙犁》,就是侯军几十年研究孙犁主要作品的汇集。如果说,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得失显示其精神高度,那

么,能否愿意帮助他人,则显示着他精神的宽度。《报人孙犁》从孙犁作为报人的角度,展示了孙犁对待编辑、作者、友人、晚辈,直至校对等工作细节的真实态度,拓宽了孙犁的研究领域,使孙犁的形象更加丰富、立体、全面。

侯军有幸与孙犁有较深的交往,并得到孙犁的充分信任,书中诸多内容,相比于同类研究作品,更加生动鲜活,并且关于“报人孙犁”的观点,得到了孙犁本人的“完全赞同”。事实上,孙犁青年时代即受大公报影响。参加革命后的几十年,都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、《晋察冀日报》和《天津日报》工作,发表的作品,也基本都在报纸上。并且,孙犁不但是个优秀的记者,而且他自己也认为“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”。

如果说,孙犁是一座文化山岳,《报人孙犁》则引导我们看到山岳的另一侧面,同样峰峦叠翠、鸟语花香。让我们看到孙犁清风朗月之外的金刚怒目,在作家出世面孔之外的报人入世形象。这本书可以加深我们对孙犁作品的理解,也让我们报人同行们,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。

书评